

中生代
思想书系

鲁迅与『左联』

王宏志
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鲁迅与『左联』

王宏志
●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与“左联”/王宏志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6.5
ISBN 7-80225-038-2

I. 鲁… II. 王… III. 鲁迅(1881-1936)—关系
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—研究 IV. 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0307号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

邮政编码:100005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E-mail: 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

销售热线:010-65512133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本:960×1300 1/32

印张:11.625 字数:278千

版次:2006年5月第一版 200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~5000 定价:29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·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(电话:0539-2925659)

目 次

革命阵营的内部论争? ——分析 1928 年革命文学论争鲁迅	
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	1
鲁迅与“左联”关系初探	40
鲁迅加盟“左联”的动机——几个论点的商榷	63
谁出席了“左联”的成立大会?	78
“左联”的组织与结构	85
也谈“左联五烈士”	111
西方有关“左联五烈士”的论述分析	126
“戴白色手套革命”的鲁迅：“同道中人”第一次公开对 鲁迅的攻击	148
“花边文学”事件：论廖沫沙攻击鲁迅的一篇杂文	164
鲁迅·田汉·杨邨人：田汉攻击鲁迅的一篇文章	172
鲁迅与“左联”的解散及“两个口号”论争	183
“敌乎友乎?”：论鲁迅与徐懋庸的关系	217
鲁迅与胡风	255

2 鲁迅与“左联”

附 录

一个伟人之死:鲁迅的生前死后	306
鲁迅翻译研究的理念思考	346
后 记	358
简体本后记	360
参考文献	363

革命阵营的内部论争？

——分析 1928 年革命文学论争鲁迅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

1928 年爆发的“革命文学论争”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。它标志了左翼作家直接参与、干预以至控制现代中国文坛的开始。毛泽东过去便曾经高度评价过这时期在文化战线上取得的胜利，〔1〕这说明了为什么“革命文学论争”在过去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及研究中占了这样重要的地位。〔2〕

正由于这个缘故，有关“革命文学论争”的论述为数不少，但因为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原因，很多研究文章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而且往往引起新的争议，所以“革命文学论争”还是有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。我们在这里会集中讨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鲁

〔1〕 毛泽东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第 2 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64 年），第 695 页。

〔2〕 除了“文革”期间外，几乎每一本在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特别辟有专门的章节，讨论“革命文学”论争，而这些章节的题目全都大同小异，诸如“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”及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等。

迅会成为革命文学派的攻击目标？〔1〕

二

鲁迅对“革命文学”的态度，是“革命文学论争”的中心问题，我们必须对它有比较确切的理解，才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迅会成为“革命文学派”的攻击目标。

今天，一般的理解是鲁迅对“革命文学”“持完全肯定的态度”，只是对部分提倡“革命文学”的人的某些做法不满意，因此，这场笔战只不过是革命阵营的内部论争。〔2〕

事实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要先看看鲁迅心目中的“革命文学”是什么东西。

本来，“革命文学”这名词是很容易理解的：凡有助于推动革命活动的文学都称得上是“革命文学”。可是，关键却在于这“革命”是什么，共产党固然可以提出“革命”，国民党也可以提出“革命”，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提出“革命”。事实上，1927—1928年间，国民党便曾倡议过“革命文学”，广州有过“革命文学社”的组织，出版《这样做》旬刊，第2期上还刊登《革命文学社章程》，提出“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，提倡革命文学…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”。〔3〕鲁迅在一篇写于1927年的文章（题目便叫《革命文学》）中提到，广州的一份日报提出应以

〔1〕 有关这次论争的文章，重要的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室编：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，第2册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）。

〔2〕 参唐弢编：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，第2册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9年），第8页。

〔3〕 参鲁迅：《鲁迅全集》，第3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第545页。

“两位帝国主义者〔唐南遮、霍普德曼〕，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〔吴稚晖〕”，作为“革命文学”的师法，正如鲁迅所说：“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”。〔1〕所以，我们得要先弄清楚“革命文学”的含义。

要更好理解“革命文学”的观念，可先看看郭沫若那篇被誉为“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”〔2〕的《革命与文学》。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就是广义的“革命”和“革命文学”以及所谓真正的“革命”和“革命文学”。郭沫若指出，每个时代的革命各有每个时代的精神，但总是由那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彻底反抗，站在压迫阶级方面的是反革命，做出来或欣赏的文学便是反革命的文学；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便赞成革命，做出来或欣赏的文学便是“革命文学”。由此可见，什么时代都会有革命和“革命文学”，而不同的时代便会有不同的革命和“革命文学”。郭沫若甚至说过周代的变风变雅和屈原的《离骚》，“都是在革命时期中所产生出的千古不磨的文学。”〔3〕这是对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一种广义理解。

郭沫若还提出了“时代精神”的问题：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，时代精神一变，革命文学的内容便因之而一变”，原来在某一个时代是革命的东西，到了第二个时代会变成非革命；某一时代的革命文学，在另一个时代会变成反革命的文学。他的结论是：“革命文学的这个名词虽然固定，而革命文学的内涵是永不固定的。”〔4〕

那么，狭义的“革命文学”又是怎样的？简单来说，这便是郭

〔1〕 鲁迅：《革命文学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，第3卷，第543页。

〔2〕 李初梨：《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》，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，第154页。

〔3〕 郭沫若：《革命与文学》，同上，第3页。

〔4〕 同上，第8页。

沫若说“今天”所应提出的“革命文学”。今天,由于“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渐渐猖獗起来”,便产生了一个新的被压迫阶级:“第四阶级的无产者”。因此,今天的“革命文学”,便应该“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,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”。他说:“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。”〔1〕这可以说是当时的“革命文学派”对“革命文学”最早下的定义。以工农大众无产阶级为依归,是这时期的“革命文学”与从前的“革命文学”不同的地方;这时期的所谓“革命”,是指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。因此,在一些革命文学家眼中,“革命文学”与“无产阶级文学”是意义相同的名词。例如李初梨便说过,革命文学“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”,〔2〕而且,没有多久,我们便看到创造社正式提出“无产阶级文学”的口号来。

那么,鲁迅心目中的“革命文学”是属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一种?其实,至少在最初的阶段里,鲁迅所说的“革命文学”,并不是创造社或太阳社成员所要求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文学,他所采取的是一种接近于广义的理解。这点是一直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。

鲁迅发表有关“革命文学”问题的意见,最早可追溯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前的4天,即1927年4月8日在广州黄埔军校所发表的演讲,题目叫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。尽管在这篇演讲里,鲁迅不断地谈到“革命”和“革命文学”,但其实他所说的“革命”原是属于含义极为广泛的名词,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反对旧的、要求改革、进步的活动,甚至跟“进化”混在一起讨论:

〔1〕 郭沫若:《革命与文学》,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,第10页。

〔2〕 李初梨:《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》,同上,第162页。

其实“革命”是并不稀奇的,惟其有了它,社会才会改革,人类才会进步,能从原虫到人类,从野蛮到文明,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。……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,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,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,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。〔1〕

在另一次演讲中,他重复了这个观点:

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,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:人类是进步的。以前有猿人,或者在50万年前吧……后来才有了原人。虽然慢得很,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,前进即革命,故青年人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。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,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。〔2〕

至于“革命文学”,鲁迅从这广义的革命观出发,提出了革命跟文学关系的“三阶段”论:

1.“大革命之前,所有的文学,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,觉得不平,觉得痛苦,就叫苦,鸣不平”,但这种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影响,只有由哀音变成怒吼的时候,才会有反抗,“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”。

2.“到了大革命的时代,文学没有了,没有声音了,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,大家自呼喊而转入行动,大家忙着革命,没有闲空谈文学了。”另外,民生凋敝,人民穷苦,也没有心思谈文学,所以在大革命时代,文学是沉寂的。

3.“等到大革命成功后,社会底状态缓和了,大家底生活有

〔1〕 鲁迅: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,《鲁迅全集》,第3卷,第418—419页。

〔2〕 鲁迅:《读书与革命——3月1日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会讲》,马蹄疾编:《鲁迅讲演考》(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81年),第172页。

余裕了,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。”这时候的文学有二:一种是讴歌革命的,这是进步的文学家希望社会改变,对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很高兴;另一种文学是挽歌,吊旧社会的灭亡。〔1〕

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,一是在这三阶段里,并没有一个所谓“革命文学”出现的阶段;二是这革命的三个阶段是适用于任何的革命的,而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革命。显然,这是一种广义的“革命”。

不过,我们又不能说鲁迅心目中并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“革命”。应该强调,在广州时期,特别是在国民党发动“清党”以前,鲁迅心目中的“革命”,并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和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,恰恰相反,他心目中的“革命”主要是指由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活动。要证明这一点,我们可以看看他这时候所写的一些文章。〔2〕

首先,在黄埔演讲前半个月左右,为了纪念3月29日的黄花节,鲁迅写了《黄花节的杂感》。在文章里,鲁迅不断地提到要继续革命,还想起了革命家的伟大。很明显,这革命家是指孙中山,由他所领导的革命,是指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,与共产党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系。〔3〕在中山大学开学仪式上的演说中,他劝勉青年“读书不忘革命,革命不忘读书”时,也重复了孙中山遗嘱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这一句话。〔4〕此外,在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里,鲁迅也多次谈到中国当时的革命,在其中一处地方,鲁迅说:“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,止有实地的革

〔1〕 鲁迅: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,《鲁迅全集》,第3卷,第419—421页。

〔2〕 关于鲁迅在广州时期的思想及活动,可参王宏志:《鲁迅在广州:〈鲁迅与中共〉之一章》,《文学与政治之间——鲁迅·新月·文学史》(台北:东大图书公司,1994年),第159—172页。

〔3〕 鲁迅:《黄花节的杂感》,《鲁迅全集》,第3卷,第410页。

〔4〕 《鲁迅讲演考》,第172页。

命战争，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，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。”〔1〕很明显，鲁迅以孙传芳为例子来解释中国需要“实地的革命战争”，就是指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活动。对于北伐的进展，鲁迅是非常留意的。还在厦门的时候，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便经常谈到北伐的情况，而在《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》里，鲁迅更明确地说自己对于北伐军收复南京和上海感到十分高兴，说这是“革命”“小有胜利”的时候。〔2〕毫无疑问，这“革命”是指由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，跟无产阶级革命扯不上关系。况且，鲁迅在文章里说广州是“革命的策源地”，也不可能说是共产党的革命活动，原因是在这以前，中共在广州并没有什么重要的革命行动，反而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是在广州举行，而广州也是筹备及誓师北伐的地方，所以才配得上“革命策源地”的称号。

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正由于鲁迅跟革命文学派对于“革命”的理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——或者更具体一点说，他们隶属不同的革命阵营，爆发论战是无可避免的了。

但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：鲁迅在讲演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时，国民党还没有发动清党，在这国共合作的阶段，即使鲁迅倾向国民党，跟亲中共的革命文学派也不能说成是对抗的。而且，这篇演讲只发表在黄埔军校的内部刊物《黄埔生活》上，当时远在日本的“创造社小伙计”根本不可能看到鲁迅这篇文章。事实上，在后来“革命文学”论争期间所有攻击鲁迅的文章里，都没有人提及这篇文章的内容。另外，众所周知，鲁迅对于国民党的清党极为不满，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便不断发表批评和讥讽国民党的言论，那么，他跟革命文学派便应该比较接近了，可

〔1〕 鲁迅：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，第3卷，第423页。

〔2〕 鲁迅：《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》，同上，第8卷，第162页。

为什么却会在这时候受到攻击？

三

鲁迅跟创造社的矛盾，可以说有历史的渊源。从1923年成仿吾写的《〈呐喊〉的评论》开始，〔1〕到鲁迅认定创造社成员故意“抹杀”罗曼·罗兰给他的一封信，〔2〕以及成仿吾发表文章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点名批判鲁迅等，〔3〕都令鲁迅非常不满。不过，尽管有着这许多的嫌隙，但鲁迅似乎一直还期望与创造社的成员合作。还在厦门的时候，他曾在一封给许广平的信里说希望到广州后，能“与创造社联合起来，造一条战线，更向旧社会进攻”。〔4〕1927年4月1日，他与成仿吾和何畏等联名在创造社的刊物《洪水》上发表《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》；还有的是1927年底至1928年初，他跟郭沫若、郑伯奇等商议好，成为《创造周报》复刊的特约撰稿人，只是最终计划没有实现，鲁迅却反成了创造社的攻击目标。

〔1〕 成仿吾在文章里把《呐喊》批评得体无完肤：《孔乙己》和《狂人日记》是“浅薄的纪实的传记”，《阿Q正传》的“结构极坏”，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和《明天》“皆未免庸俗”，而《一件小事》“是一篇很拙劣的随笔”。《〈呐喊〉的评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：《1913—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》，第1卷（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第44—47页。

〔2〕 1926年1月24日，《阿Q正传》的法文译者敬隐渔写信给鲁迅，说罗曼·罗兰曾盛赞《阿Q正传》，并说曾将罗兰的原话寄到创造社去。但鲁迅并没有收到创造社传消息，认定是因为他跟创造社关系恶劣，创造社中人故意把信藏起来。鲁迅1933年12月19日给姚克信，《鲁迅全集》，第12卷，第296页。对此，郭沫若曾作答辩。郭沫若：《一封信的问题》，《创造社资料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第813—816页。

〔3〕 成仿吾：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，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，第17—23页。

〔4〕 《鲁迅全集》，第11卷，第191页。

关于这个转变，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成仿吾从日本带回了一批年轻人，反对与鲁迅联合，并把鲁迅变成打击的目标。这也是郭沫若在回忆录《跨着东海》里所提供的说法：“两个计划彼此不接头，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”。〔1〕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如果没有这班人从日本回来，带来新的构思，与鲁迅合作的计划也许会有付诸实践的可能。

但无论如何，鲁迅很快便成为创造社的攻击目标。毫无疑问，革命文学派的战斗意识是十分强烈的，但问题是：为什么这班从前与鲁迅毫无瓜葛的“少壮派”要选中鲁迅来进行批斗？

其实，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事实，是这些所谓的少壮派原来是没有意图特别针对鲁迅一人的，他们只不过把鲁迅看成是众多需要打倒的对象的其中一个，只是因为鲁迅对于这些批评做出还击，才变成了众矢之的，受到火力集中的攻击。这点只要看看第一篇发难的文章——冯乃超的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，便可以确定了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冯乃超点名批判了四位作家，分别是鲁迅、叶圣陶、郁达夫和张资平。除了鲁迅外，他们全都没有发表过有关革命文学的言论，即使是鲁迅，冯乃超也没有半句提到鲁迅的文学观，更不要说黄埔军校的演讲了。但在冯乃超眼中，这四人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都是落伍和灰色的：叶圣陶和郁达夫都是“典型的厌世家”，张资平则“没落到反动的阵营里去”；至于鲁迅，冯乃超把他称为“鲁迅老生”，“常从幽暗的酒家楼头，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”，他只反映了“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”，“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”。〔2〕由此可见，冯乃超是把鲁迅看成落伍的老作家，

〔1〕 郭沫若：《沫若自传》（香港：三联书店，1978年），第3卷，第289页。

〔2〕 冯乃超：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，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，第116页。

认为他跟别的一些成名作家一样,显然不属于革命文学的阵营。值得注意的是,早在1927年成仿吾在广州写的一篇文章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,与冯乃超这篇文章如出一辙:他也攻击了好几位成名作家,包括鲁迅、周作人、陈源、徐志摩和刘半农;另外,他说鲁迅“坐在华盖之下”,“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。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,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,闲暇,第三个闲暇”,〔1〕都是指责鲁迅没有跟上社会和时代的步伐。证诸郑伯奇的回忆,成仿吾在去日本时曾与这班小伙计见面详谈,〔2〕可以推想,这是成仿吾灌输给他们的一些看法,否则,以一些一直在日本居住和受教育,对中国文坛毫不认识的年轻人,不可能马上对鲁迅及别的作家有这样明确的见解。

但认定鲁迅是落伍的不只成仿吾和他的小伙计,太阳社的钱杏邨的态度更强硬,他所写的《死去了的阿Q时代》更是为人所熟悉。为什么会这样?我们必须看看鲁迅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分歧。

本来,同属于“革命文学派”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本身也有严重的分歧。在运动的初期,他们曾公开争论过一些很基本的问题,例如对行动与理论的不同重视,还有两派的宗派思想,导致他们争论究竟谁最先提出“革命文学”的口号等。不过,他们很快便认定了共同的敌人,两派甚至召开会议,结束论争。

然而,即使在他们相互之间有着争论的时候,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在行动上有一点是一致的,那就是对于旧作家的猛烈攻击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过成仿吾和冯乃超怎样批判几位成

〔1〕 成仿吾: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,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,第19—20页。

〔2〕 郑伯奇:《忆创造社及其它》(香港:三联书店,1982年),第51页。

名作家,但其实在较早的时候,太阳社的蒋光慈已表现出他对旧作家的无法容忍。在《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》中,他说很多作家与旧世界的关系太深,不能适时摆脱,写不出革命的东西来。〔1〕在另一篇文章里,他也具体地指出旧作家的问题,诸如说他们只能在文学中表现“旧的倾向,是反动的一方面,而忽略了新的,能够创造光明的力量”,〔2〕又或是只表现了个人主义的倾向,忽视了群众的生活等。〔3〕可以说,尽管蒋光慈没有像冯乃超那样点名批判这些作家,但他的立场却十分明确,完全不期望旧作家能对“革命文学”有所贡献。

更惹人注目的是钱杏邨对鲁迅的批判:《死去了的阿Q时代》。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,我们在下面会再讨论,不过,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差不多同时对鲁迅展开攻击,使很多人相信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。一些台湾学者更认为“革命文学”论争是由中共所发动的,目的是要攫取文坛的领导权,〔4〕有的甚至把这场论争联系到1930年“左联”的成立,把它说成是中共拉拢鲁迅前的一个准备工夫,“是中共做成的圈套,先打后拉”,从而迫使鲁迅屈服。〔5〕这些说法表面看来很合理,尤其是创造社和太阳社曾经开会讨论“革命文学”的问题,但事实却不是这样,主要的论据有以下几点:

第一,如上面所述,鲁迅最早在革命文学问题上受到攻击的,是成仿吾在1927年1月发表的《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》,而

〔1〕 蒋光慈:《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》,《“革命文学”论争资料选编》,第84页。

〔2〕 蒋光慈:《关于革命文学》,同上,第142页。

〔3〕 同上,第144页。

〔4〕 郑学稼:《鲁迅正传》(台北:时报文化事业公司,1978年),第195—196页。

〔5〕 赵聪:《30年代文坛点将录》(香港:俊人书店,1970年),第48页。

这篇文章攻击了好几位作家,甚至包括了鲁迅的死对头陈源。这说明了“革命文学论争”并不是中共要特别挑出鲁迅作为攻击的目标,以求推动革命文学运动。此外,成仿吾这篇文章在1927年初发表,距鲁迅正式受到创造社及太阳社的成员在1928年围攻有整整一年的时间,如果说共产党有意向鲁迅发动一场总攻击,在时间上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异。更重要的是:1927年1月,成仿吾还没有加入共产党,而冯乃超写那篇正式引起“革命文学”论争的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时,也不是共产党员。其次,太阳社第一篇点名批判鲁迅的文章,就是上面提过钱杏邨的《死去了的阿Q时代》,当他发表这篇文章时,太阳社跟创造社的成员之间还在激烈争论着一些有关“革命文学”的基本问题,不可能合作向鲁迅发动攻势。

第二,上文也简略介绍过,在这场论争中,这两个左翼文学团体开始时曾互相猛烈攻击,所争论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,诸如倡导革命文学的领导权问题,革命理论还是革命经验,以及理论文字还是革命文学创作较为重要等。如果我们说这场论争是由共产党所指挥发动的,便绝对不应该会有这些矛盾和分歧;而且,我们也指出过,创、太二社的成员都表现了强烈的小集团及宗派主义思想,不可能受命于同一个组织,特别是共产党这样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。事实上,创、太两派最后要开会来讨论及解决这些问题,而这些会议的主持人是创造社的成仿吾。上面说过,成仿吾那时候并不是共产党员,而那些会议也没有什么纪律,杨邨人说开会的时候“十几人你一句他一句,七嘴八舌,秩序大乱”,〔1〕张资平甚至把小女儿也带同出席,还因为给女儿闹

〔1〕 杨邨人:《太阳社与蒋光慈》,《现代》第3卷第4期(1933年8月1日),第474页。